



杨先国 贾之惠 编著

清中期·川东北

白蓮教起

義始末

四川省社会科学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編

四川民族出版社

92
5249.201

物
法
国

贾之惠 编著

清中期·川东北

白莲教起義始末

四川省达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 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北京圖書館藏

B

1249.201

清中期川东北白莲教起义始末

★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达县市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6 字数167.6千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书号: M ISBN7-8499-0375-1/C·17 定价: 2.90元

序

清嘉庆元年（公元一七九六年）爆发的白莲教农民起义，由湖北首先发难，四川随即响应，迅及川、楚、豫、陕、甘五省。这场规模巨大的起义，使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统治王朝——清政府动荡不安，惊恐万状，从全国抽调劲旅大肆镇压。据当时的官方统计：集中了蒙、满、汉官兵五十二万（绿营乡勇百余万在外），战马四万三千匹，调拨军粮一千二百七十三万多石，消耗库银一万万多两。虽然清廷用尽了残酷狡诈的手段，杀人数百万，也没能将义军迅速扑灭，白莲教义军的斗争，仍然坚持了长达十年之久。义军的武装斗争，撕破了清王朝所谓“乾嘉盛世”的面纱，使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暴露无遗；同时，还对统治者内部的腐朽没落与贪婪荒淫作了彻底的揭露。自从发生了这次起义，经历了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便从此一蹶不振，濒临灭亡。这次起义，为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拳”起义，提供了思想、组织、军事等多方面的准备，对我国近代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意义之深远，不容低估。

近几年来，作者涉猎了有关此次白莲教起义的五省“通志”及州、府、县、厅“志”，发现均记载简略，很难看出端的；很多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记述互相冲

突，莫如孰是：而撰写人的立场，受时代局限，多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者。鉴于这些材料均是零星的记述，目前国内还无对此起义作系统记述的专著，人们不能有系统的了解与认识；加之当时全国白莲教义军八大主力，其中五支主力都是我们家乡——巴山南麓的英雄儿女所组成。他们战斗得多么英勇顽强，牺牲得多么从容壮烈！作为后代，岂容先辈血迹随岁月流逝而湮灭？为此，我会特组织力量，搜求前人遗墨，今人新论，参考清廷档案，有关方志，多次实地考察，比较史实，推敲真伪。经过五、六年辛劳，才将浩瀚零散的史料有系统地按编年体整理记录下来，成了今天这本小册子。需说明的是，八支义军主力多互相配合作战，故湖北三支主力亦附述之。

由于典籍浩瀚，散藏四处，搜求不易，饱览更难，只是尽力而为。更因我们水平低，能力弱，不妥之处必不可少，尚望读者指正。

本书的撰写，得到县委、县政府、地区文化局、群众艺术馆、县文教局、财政局及曾子谋等不少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谨将这个册子奉献给即将来临的清中期白莲教农民起义二百年祭，以表赤诚。

朱光明

1990年7月4日于四川达县

目 录

- (1) 序
- (1) 川东北白莲教起义始末
- (232) 附表一 川东北白莲教义军首领
及骨干简表
- (247) 附表二 被白莲教义军击毙的清
军将佐简表
- (261) 附表三 参考书目
-

—

白莲教（明代以前曾称为明教），是五代时始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民间宗教组织。它综合了摩尼教、罗教、佛教白莲宗、道教弘阳派等宗教教义，组成了一个特有的、自成体系的宗教组织。其传承的主要经卷有：《混元红阳显性结果经》、《释迦偷花经》、《消释收元行觉宝卷》、《下生叹世宝卷》等等。经文通俗易懂，并不神秘，主要宣扬宇宙历史三段式说，即在产生万物的最高神灵无生老母的安排下，将历史分为过去（青阳）、现在（红阳）和将来（白阳）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元始天尊为万物的主宰，过了十万八千年，青阳时期结束，进入第二阶段。这时，发生了释迦与弥勒二人争夺主宰权的问题。无生老母提议二人比试道行，看谁先入定，入定后谁的龙杖顶先开莲花谁胜。弥勒先入定，弥勒的龙杖顶先开莲花。可是，心术不正而不能入定的释迦偷摘了弥勒杖顶的莲花，插在自己的杖顶上。结果，释迦就作了历史第二阶段（现在）万物的主宰。由于“释迦偷花降世人负劫，累计九九八十一劫”，所以，这是现在人间饱受一切苦难的根源。现在的统治者（从皇帝到官吏）都是释迦豢养的猪狗。如今，已到人间最后一次劫难的时候了（经文中称之为“末劫”），是“红阳劫尽、白阳当兴”之际。末劫中，释迦会大降水、火、瘟、蝗、兵诸灾于世人。无生老母为了拯救世人，已派弥勒降世。白莲教徒只有带领民众，杀尽释迦猪狗，迎接弥勒降生，迎

接历史的第三阶段（也是最理想的最高境界）的到来。这一阶段，万物将由弥勒主宰，白莲教友将全部返回“真空家乡”，生活在无生老母身边，过永恒幸福的生活。

白莲教经文中，虽然迷信成份不少，但仍然可以看出它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地方。其它宗教（原始宗教除外），多属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对现实存在的不合理社会，总是劝人忍受，以求死后进入天堂。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或民族，顶多“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挤出几滴同情的泪水”而已，所以有“精神鸦片”之称。而白莲教则不同，对现实不合理的社会，对人民的痛苦，它不主张忍受，而是主张斗争，不惜一切代价去斗争。并提出“天上换玉皇，海底换龙王”，“换乾坤、换世界”的口号，矛头直指封建统治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白莲教屡受封建王朝残酷的镇压，不得不变成地下宗教。正因为屡遭镇压，不得不在受一次镇压后改一次教名。这些特点，便成为白莲教名称多、派系多的根源。

北宋时，方腊起义失败，在赴刑场时曾公开承认“吾本白莲”，这是白莲教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元末农民起义军主力之一的红巾军，就是全由白莲教徒组成的武装力量，曾为建立明王朝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农民了皇帝宝座，反过来镇压白莲教时，白莲教就用起义行动来反抗镇压。影响较大的如山东巨野人徐鸿儒领导的起义，曾攻破了巨野、浑城、腾县，一度终断了运河漕运；四川大足县人蔡伯贯及稍后的白台仙起义，曾先后占领了合州、大足、铜梁、荣昌、安居、定远、璧山七州县，建国大唐，国号宝丰。

以游牧为主的满族入关，用武力打垮了汉族政权，建

立了清帝国，便一方面采取习读汉文、修经纂史，甚至开科取士来笼络汉族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用免进贡、免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多少减轻了一点人民的经济负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出现了短时间的缓和，因而白莲教起义也很少发生。

惜乎这种矛盾的缓和期不长，并逐渐因统治阶级自身的腐败而加剧。概略情况如下：出身游牧民族的满清王公贵胄与上层八旗子弟，作了生产力较为发达的中原统治者之后，在学习汉俗汉文中，最先学到而领会最深者，莫过于汉族统治者的不治之症，——奢侈与享乐。这一点非常普遍，其中又以皇室为最。首先是大肆建造游乐园，如北苑、圆明园与后来的颐和园，均属此类；然后是招工大造坟茔，如东、西二陵；为了尽情享乐，从京城扩展到江南，如康熙、乾隆各六次“巡幸”江南，到处修行宫、建辟馆，以供享乐，皇室如此，王公大臣们更纷纷效尤，组戏班、养优伶；用大量的金银珠宝去争换西洋舶来的时钟及玻璃器皿等，成了当时的时尚。这样一来，朝野一派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成风，不贪不受贿就不能满足自己的奢侈与享乐，所以几乎达到无官不贪的程度。康熙也曾试图惩贪，杀了几个大臣，但终不能收效，为了“官为我用”，只好作罢。尤其是施行捐官制之后，贪贿之风，公然通行。时至乾隆后期，和珅大权在握，其腐败之深，更是无以复加了。史书上载：“内而尚（书）侍（郎），外而（总）督（巡）抚，尽出和门，天下事无一而不败坏。盖乾隆帝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其不出于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府庠告竭，闾阎愁惨，而人思走险矣！”

在所谓的“乾嘉盛世”，清帝国内部已经腐败不堪的同时，对外施行武力称霸，派兵远征缅甸与安南；对内施行血腥的强权统治。对西南各少数民族强行“改土归流”（改土司管辖制为州县官吏制），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清帝国则采取了军事镇压，乾隆曾先后出兵镇压了新疆、甘肃、宁夏的回族，四川、青海、西藏的藏族，湖南、贵州的苗族及台湾的少数民族。并吹虚为“十全大武功”，自号“十全老人”。另一方面，在血腥镇压少数民族的同时，对国内不满当局的汉族知识分子，则大兴冤狱（后被称为“文字狱”）来进行迫害，不但对本人用其诬刑，而且诛连甚广。自顺治五年“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起，至乾隆五十三年“贺世盛笃国策案”止，计重大文字狱共八十一起，杀戮汉族文人学士及其亲友数千人，连已死黄泉者亦不放过，必敞坟戮尸。这些就在汉族中下层知识分子中播下了恐怖与仇恨。

除上述之外，国家官吏的腐败，引起土地的迅速兼并；汉八旗军队的建立、镇级军事机构的大量添设，进行了大量的圈地，无数肥沃的田地因成为官产（或官吏的私产）而抛荒，加上自然灾害的因素，就使得千千万万世代依附于土地的农民丧失了生活的依托，变成为山林中的“棚户”或中小城市中的无业游民。这些人数众多的农民，亟望改变现实环境。在清政府实行禁止私盐私铸之后，又使许多从事熬盐、采矿与冶炼的工人失业，四处流落，无以聊生。这样，激起了下层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潜在的、强烈的反抗意识。后来，正是这些人成了白莲教起义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剥剥压迫愈深，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反抗也愈烈。由于

上述的种种原因，白莲教恰好代表了下层民众的意愿，举起了反抗封建剥削和异族统治的义旗。

乾隆中期，白莲教便以宗教活动为手段（如集中教徒诵经祈祷或画符治病活动）来宣传其政治主张。同时，借传授武术以防暴强身为名，来组织武装教徒与群众。凡要求入教者，需缴纳一定数量（视其经济情况而定）的钱或粮，称为“根基钱”。这笔经费除供传教者作活动经费外，多用来周济贫苦的教友和教外群众。因此，白莲教便迅速获得了许多劳苦民众的拥护。他们在原有政治口号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纳税授田”、“穿衣吃饭不分你我，不持一文可行天下”、“是男是女本无二，都是无生老母血”等等口号，充分反映出当时农民要求土地、要求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后来，再进一步提出了“满清数已尽，日月属大明”的口号，把反抗封建统治与反抗民族压迫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白莲教收元派与混元派首领宋之清与刘之协，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邀集了湖北的齐林、姚文学、樊学鸣，陕西的肖贵、韩龙，四川的谢添绣等教中首领共商起义大事。商谈结果，定于第二年（公元一七九五年）春节三省同时揭竿，推翻清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眼看快要就绪时，不幸机密泄漏，遭到官府的大搜捕。除刘之协一人外，上述三省白莲教首领及一百多名骨干被捕，惨遭杀害。残暴的朝廷为了斩草除根，又以六百里加急廷报传谕各省、州、府、县，严令“缉拿教案”，凡白莲教徒“毋使一人漏网”。这一道命令，竟成了大小贪官污吏的生财之道，使川、陕、

楚三省无辜的百姓倍受其害。对被 抓 的 人，肆意敲榨勒索，“不管信教不信教，只看给钱不给钱”。交不出钱的穷人，要受“铁钉钉壁”、“铜锤击脑”等亘古未闻的酷刑。被关押者饿死、囚死、刑死者成千累万。仅以川东北达州为例，当时朝廷规定，每州设州役（包括马、步、快三班）五十八至六十人，可是达州知州戴如煌为了借缉教案以肥私囊，竟然暗设州役五千名之多，由此可见一斑。其勒索对象，不止城乡贫民，殷实富户也在所难免。“前批州役未去，二批又抵家门”，往往被榨取一空。“富破家，贫陷死”，就是旧史家对当时“缉拿教案”的真实描绘。

清廷腐朽而残酷，官吏贪婪而狠毒，穷苦百姓没法活下去，到了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唯一的出路，只有用武力反抗。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楚、陕三省白莲教继起的首领们密商，决定再次组织起义，时间选在“辰年辰月辰日辰时”，即丙辰年（公元一七九六，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清晨，三省同时举起反叛满清王朝的义旗。

二

嘉庆元年（丙辰，公元一七九六年）

正月初八日，湖北省枝江县白莲教教首聂杰人，邀约了宜都教首张正谟、刘鸣才、刘宏铎、向瑶明等召集数百教徒正在筹备起义，被官府获悉，立即派衙役到聂家缉拿。聂杰人等被迫杀了衙役，提前举行起义。初十日，聂杰人等组织数千义军，占据了枝江县境内的灌湾脑，竖起了白莲教农民义军反清复明的第一面大旗。

二月十四日，当阳教首杨起元起义响应，率领义军攻破了当阳县城，杀死知县黄仁，在当阳县建立了据点。接着，长江南岸边远的来凤县里，杨子放、谭贵等也竖旗起义。西北方的郧阳县，教首曾士兴亦率众起义，并于二十一日攻占了竹山、保康两座县城，杀死了知县陈世章与刘大成。二十六日，杨子放率义军攻破了来凤县城，杀了知县庄纫兰。不多几时，白莲教农民起义在湖北西部的长江和汉水流域一带迅猛展开。这下可慌了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的手脚，一面赶忙调兵三千到荆州防止义军东进汉口；一面奏请朝廷调西安将军恒瑞入楚协剿。恒瑞接旨后急领满州兵两千，由陕西安康进驻湖北郧阳。同时，四川总督老将孙士毅也率领在湖南镇压苗民起义的川军从秀山、酉阳直逼来凤。这样，义军与官军两军对垒，摆开了战场。

三月初二日，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嘉庆皇帝颙琰早就阅

读过元、明两朝有关白莲教的案卷，知道镇压白莲教是十分棘手的。他深恐在楚官军不能奏效，急诏调都统永保由新疆到湖北，和起用被革职的前四川将军、总督、三等侍卫的鄂辉，授以头等侍卫的新衔到湖北，协同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剿灭白莲教义军。清廷调兵遣将，兵力的突然扩大增强，对义军是很不利的。所以，在本月初，首举义旗的枝江教首聂杰人就在一次战斗中被俘杀害了。但是，各地新的起义还在持续不断，特别是宜昌府境内的白莲教徒，数日之内就有林之华在长阳县的九州河，覃士辉在花兜屋场，覃佳跃、覃佳兰、覃佳蕃在风火山，先后举起义旗，然后合兵屯驻榔坪。南漳、保康两县境内，也有几支人马起义配合。

到了三月初十，即辰年辰月辰日——预定总起义的日子，以被害老教首姚文学的儿子姚之富、樊学鸣的儿子樊人杰、齐林的妻子王聪儿（俗称齐二寡妇）为首，联络了教首王廷诏、刘启荣、张汉潮、张天伦、高均德、王光祖、齐幅谟等，拥众一万多人，在汉江东宜城境内的黄龙垴（是宜城、襄阳、枣阳三县交界处）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这支白莲教义军队伍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对清廷的威胁也最大。起义的第二日，就决定为被杀害的教友报仇而攻打襄阳府。由于鄂辉率领的官军防守甚严，久攻不下，才放弃了这一计划。三月十六日，四川总督孙士毅用镇压大、小金川时俘虏的藏民去围攻来凤县城的义军。杨子敖率领的义军部队初战失利，突围退守狮子坪。二十二日，河南巡抚景安派遣南阳镇总兵揆明，领山东兵一千到襄阳协守。二十八日，林之华、覃佳跃率领义军攻打宜昌城。城虽然没有攻破，但在秀峰桥的伏击战中，杀死了官

军守备张鼎。三月底，襄阳义军攻打襄阳不克，转而向北，一举攻占了湖北通往河南的要冲吕堰驿，全歼了巡检王翼孙率领的官军。朝廷忙调已驻南阳的直隶提督庆成率正定和顺德兵前往镇压。当庆成赶到吕堰驿时，义军早已不知去向。诺大个驿站在二十九日就被义军焚毁，成了一片瓦砾。

四月初，以姚之富、王聪儿等为首的襄阳义军离开吕堰驿之后，分成了若干支队，活动在河南省的唐河、定县、新野等地的广大平原上。这使河南巡抚景安大为惊恐，忙调重兵列阵南阳。他哪里知道义军不仅没有北上攻打南阳，反而悄悄南下，由枣阳回到了湖北，并于初七日西渡了汉水围攻樊城。隔河防襄阳的鄂辉与樊明，在城楼上眼睁睁地看着樊城突然被围，而无法渡水去救，只有下令集中火炮轰击对岸围城的义军，使义军受到一些伤亡。初八日，义军一气之下齐向樊城内抛掷火球，城里木房顿时火焰冲天。隔岸的鄂辉、樊明等急得跺脚。当天，樊城烧成灰烬。初九日，义军又突然东渡汉水，包围了襄阳府。在府城的长门、东门、南门三方面展开了攻城战。义军战手黑压压地一片，头顶门板桌椅等物，来抵御城上的枪炮箭镞，一次又一次地冲向城垣。但终因襄阳城高兵多，义军久攻不下，不待官军援兵赶到就主动撤走，经茨河（南漳与谷城交界处）向宜城进发。四月的湖北，官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白莲教徒八方起义，不知该按哪一起。但在与义军交战的某些局部战斗中，官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如恒瑞、永保的部队攻破了保康县城，守城的义军教首曾士兴受伤被俘遇害。这支义军只好放弃县城到山区继续与官军战斗。本月底，在襄阳义军的带动下，枣阳县

白莲教的教徒也揭竿起义了。

五月，清廷为了迅即歼灭湖北白莲教武装义军，又作了增兵添将措施。除新调大量索伦骑兵飞驰湖北外，还把在湖北服刑的蒙古盗马贼全部赦免，编入军队来镇压起义；又调遣了著名将领，一等侍卫、将军（伯爵）明亮领兵奔往襄阳助剿。嘉庆皇帝颉琰在给明亮的手书中说：

“该处（指襄阳）兵多将广，自可将附近匪贼迅就歼除。”这位新登基的皇上满以为调明亮入楚，白莲教农民起义定然被扑灭无疑，谁知事与愿违。五月初，杨子敖率领义军向四川游击董宁的官军发起进攻，打得川军大败，还击毙了把总刘荣。初四日，楚金贵、鲁维志在孝感厅也率众起义，杀死了参将刘景龄，占领了胡家砦。初七日，林之华、覃佳跃大败官军，乘胜夺回了风火山，巴东、归州因而宣布戒严。襄阳义军在宜城边上虚晃了一枪后，便迅速北上，占领了吕堰驿附近的王家楼、刘家集和双沟几处地方。五月初六日，朝廷集结了明亮、西安将军恒瑞、永保、鄂辉等部主力开往吕堰驿，希图重点围剿襄阳义军。初七至十一日，由于连降五天大雨，双方对峙，没有交战。十二日黎明，天晴，住刘家集的义军向围剿的强大官军发起了反攻；王家楼和双沟两处，义军也毫无惧怯地迎战了官军。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给官军以相当大的杀伤，一直战斗到十三日深夜，义军突然改变了战略，除留下一部分人马在唐河两岸的双沟、张家集和孟家集等处牵制官军主力外，其余全部迅速东撤。义军主力以飞快的速度昼夜兼程，十四日下午，突然包围了枣阳县城，城内立即断水。十六日，义军留下的狙击部队经不住强大官军的攻击，由双沟撤到官庄，但离枣阳更近。十七日，围剿枣

阳县城的义军主力也撤围返回官庄。于是，义军全部集结官庄，准备正面迎战官军。十八日，襄阳义军对前来追剿的官军又来了个出其不意的迎头痛击，从中午战到黄昏，歼灭了官军的先头部队后，又冒雨撤离了官庄。二十五日，襄阳义军在王家岗（距枣阳县三十里）再一次摆队迎战了官军，并预先设下埋伏。这场战斗，义军伏击并全歼了官军的后队，然后撤离战场，南渡滚河而去。由于襄阳义军牵制了湖北官军的主力，减轻了其他各部义军的压力。杨启元所率领的义军，虽遭湖广总督毕沅所部的围攻，仍然坚守在当阳城头。其他义军部队的根据地同样寸土未失。

六月初八日，清廷为了使湖北的军政大员有统一的指挥调度，任命永保总统湖北诸军。一等侍卫、将军（伯爵）明亮，早与永保不和，现居永保属下，心中自是不悦。永保上任后，即组织力量对付襄阳义军。襄阳义军渡滚河后，以姚之富为首的主力南下钟祥，留下了刘启荣所部义军断后，节节狙击。上旬，在蒋家垱、董家岗，中旬，在梁家岗，下旬在张家岗等地，都进行了艰苦的狙击战，双方各有伤亡。十五日，官军进攻孝感胡家营，中了楚金贵所部义军的埋伏，官兵大败而去。十六日，四川总督孙士毅率部占了小坳之后，又与副将福宁分兵围攻旗鼓寨。谭贵所部义军得到消息后，留下少数战手守寨迎击，而率大队三千人马绕道从官军背后袭击。福宁见势不好，先自率官军逃去；孙士毅孤军前往，一战，官军惨败，被义军击毙的参将、千总级将佐近十名，兵卒被追杀而跳河淹死者甚众。二十七日，当阳义军首领杨启元被叛徒杀害。月底，四川总督孙士毅病死军中，川军由成都将军观成率领。